



建设生态文明,中西方需要彼此

——专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、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·沃斯特

中新社北京6月3日电 作者 王肃宁 王宗汉

生态学——这一诞生于19世纪的理论学科正在今天的世界引起更加强烈的关注与文化共鸣。何为生态学?生态文明建设如何牵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?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、美国环境史学家创始人之一的唐纳德·沃斯特(Donald Worster)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。他指出,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应对物质环境变化时,尝试做出的文化回应。生态文明的建设,需要中国与世界共同实现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中新社记者:何为生态学?生态学对人们自然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唐纳德·沃斯特:“生态学”这一概念来自查尔斯·达尔文。达尔文认为,自然自身创造了万物之间的联系,并使这些联系得以运行。

我认为,对于地球在这个浩瀚宇宙中展现出的独特与美丽,人类没有足够的认识。而达尔文则意识到了这一点,感叹地球是一个“奇迹”(miracle)。而人类,只是这个生生不息的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,且无论人类存在与否,自然的演化都会不断延续。达尔文之后的生态学家,更多看到的是生态系统中各部分的相互关联。

生态学与自然万物相关,人们需要找到维系相互间关系的方法。所以,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尊重自然科学的前提下,在应对物质环境变化时,尝试在文化层面做出的回应。

建设生态文明超越不同的社会制度,对现存环

境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。其较少受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,追寻关于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与物种的知识,唤醒人们对于自然万物及对自然本身的责任。

中新社记者:中美学界在生态领域的研究现状如何?

唐纳德·沃斯特:目前,在环境史、生态学等相关领域,美国投入了大量资源,拥有很多人才。据我了解,中国正对环境保护学、环境资源和土地保护等研究领域加大投入。

中国对待生态文明的观念令人印象深刻。了解地球的运作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一环,但这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,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教育教学,都需要很多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。中国正在这些方向持续努力,我对此非常期待。

中新社记者:您即将出版的新书《欲望行星:人类时代的地球》着重提到“生态+文明”,称在过去20年间,新的生态文明愿景在中国得以发展,且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显著。您如何看待中国保护环境、存续中国独特文明的做法?

唐纳德·沃斯特:中国正在做一些好事。比如,当今的中国正在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,美国和其他国家也都正在这方面努力。实现可持续性需要各种尝试。

在过去的20年间,新的生态文明愿景在中国的发展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显著。虽然“生态文明”的概念源于西方,但在哲学、诗歌、科学与艺术中,中国自身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资源(intellectual resources),可以上

溯数千年,这些文化财富赋予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愿景的独特性与创造性。

中国人总是说,接受矛盾,而后求同存异。保护中国的环境,存续中国的独特文明,与此同时,推动文化与物质改革向更高水平发展。在这种思想中,“生态”占据重要位置。中国最高层将“生态文明”的愿景变为中国未来的基本要旨并写入宪法,令中国成为迄今为止,世界上唯一一个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。

如果中国希望见证一种生态文明生根发芽,那它需要更加熟悉过去一个世纪中,那些为技术文明提供了精辟诊断的西方哲学家。与此同时,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,也需要对中国自身的传统更加熟悉,对中国关于责任与道德的思想更加熟悉。我们需要彼此。

中新社记者: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益于建设生态文明?

唐纳德·沃斯特:我不是一个传统主义者。我们不能回到过去,只能一步步向前迈进。对于当今社会而言,人类必须注重将所居住的城市建设得与现在不同。

对于这个问题,我喜欢用“可持续的”(sustainable)一词进行回答。尽管没人知道它的确切定义——因为每个人心中对这个词都有自己的定义,但这无伤大雅。我们会通过对话找出如何创造一个可持续的、繁荣的生活方式。这是我们在面对地球上出现的各种生态危机时应该去做的,而非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。

中新社记者:过去百年间,世界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,人类正面临生态

危机。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?

唐纳德·沃斯特:我在《欲望行星》中提出,人类面临的所有生态问题都来源于自身欲望。世界历史翻开第一页的时候起,就没有一个历史时刻能拥有完美的生态,但近年来,人类之所以面对各种严峻的生态问题,归根结底,是因为我们向自然索取得太多。

不可否认,人类有着各种各样的欲望。但人类应该学习控制、调节这些欲望,以期与外部世界达到和谐。我非常喜欢中国的“小康”(moderate prosperity)概念,其中有着和谐的意蕴。

尽管做到这些很难,但我仍对此充满信心,我希望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如何做到这一点。

中新社记者:生态文明建设,需要重视对人观念的塑造。对此您怎么看?

唐纳德·沃斯特:单纯通过某条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条文,对于人观念的改造毫无意义。建设生态文明是世界上所有人应该做的事,应该如同围坐在一张圆桌旁那样进行讨论与思考,因为没有人知道“生态文明”的确切含义,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愿景。

生态学的研究与学习应是全世界各地科学教育的一部分,科学是时刻变化的,所以这种教育应采用开放的形式(in an open way)。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以强制的方式实现,应当以一种潜移默化([spokesperson])的方式进行。

中新社记者: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复杂,但是国际普遍对气候领域合作保持积极态度。您怎样看待全球气候治理



唐纳德·沃斯特教授近日就此在北京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。

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

的互动与合作?

唐纳德·沃斯特:解决这一问题,需要人类改变对环境的态度。我相信,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,但这并非通过某个或某些国家就能实现。不同的国家与文化,对于解决气候问题有着不同的主张与诉求,但求同存异理应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。

主导未来的,应是那些拥有新观点并能将其付诸实施的“发言人”(spokesperson)。因为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未知,解决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任何领域。基于此,我们应该逐步向前,寻找更多更新的技术。保持开明与耐

心,才能聆听到每个人对于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。”

谈到“可持续的”(sustainable)一词的定义,我曾提到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。我们需要对话,共同找出所有人都认同的方法,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世界。

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,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解决,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开启人类的未来。各国需要加强合作,共同制定政策和措施。这也是我持续到世界各地讲学的原因——人类的未来在于全世界的互动与对话。

姚中秋:如何破解“古今中西之争”?

中新社北京6月1日电 作者 姚中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、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

“古今中西之争”,指一百多年来围绕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而多次爆发的、以古今中西之文化资源取舍为中心的思想争论。

近代以来,西方列强入侵,中国连遭失败,陷入文明危机,“中国向何处去”成为思想政治之中心问题,古今中西之争因此而起,几乎所有近现代思想家、政治人物和学术派别都卷入其中,持续上百年。

古今中西之争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,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曲折复杂,久未尘埃落定。五四运动中,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,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实践,走上了一条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与发展实践,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,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本奠定。今天,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,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条件。

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如下论断:“经过长期努力,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‘古今中西之争’。”今天中国思想学术界也有条件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理论上的论定。

古今中西之争从何而来

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生,很大程度上源于一度占据主流

的自由主义思维方式误解了中国根本问题。19世纪中后期,中国接连败于西方列强(以及率先学习西方的日本),士人、知识分子不能不对此作出解释,说明西方何以强大、中国何以落后。这一解释又有重大规范意义,决定变革的方向、道路、战略。

清末民初几十年间,陆续出现了几种不同解释。1922年,梁启超为纪念申报建馆五十周年,写作《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》,对此予以总结: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,有了洋务运动;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,有了戊戌变法、建立中华民国等政治制度变革;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,有了新文化运动、启蒙运动等思想观念变革。在这里,梁启超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中国思想、政治发展变化的历史叙事,影响广泛而深远。

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误读

现在看来,梁启超的事实描述大体没错,价值判断却不能成立。古今中西之争的关键争论点在于西方因何强大。很多人将其归因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,再由此上溯至历史性存在的整个西方文化,如古希腊的哲学和民主。

事实上,西方的兴起,始于征服新大陆和建立殖民贸易体系,通过“战争资本主义”进行原始积累,并由此率先发生工业革命。此后,凭借生产力优势赋予的暴力优势,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侵略亚欧大陆众多民族、国家,

才有了西方的强大。

就此而言,最早与西方接触的林则徐、魏源,以及洋务派等人的认识,反而最接近事实真相;西方之强在于其坚船利炮,因此中国应当推进工业化,优先发展重工业、军事工业。但因内外条件约束,这场工业化运动的成果未如人意。一方面,由于权力地方化,中央政府丧失了推动工业化的能力和资源;另一方面,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兴起,压缩了中国的自主发展空间。

士人的危机感陡然加深。恰在此时,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严复等人的译介传入中国,提供了解释世界的一种新范式,中国精英也据此解释西方强大、中国落后的原因。随后,严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士人、知识分子接受了自由主义理论,据以推进制度变革,包括戊戌变法、清末新政、清末立宪、建立中华民国。

在此过程中,国家看上去实现了宪政、共和,但组织化程度反而持续下降,日益丧失领导、组织、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意志和能力。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几年,国家依旧内外交困、混乱动荡。

新兴知识分子又一次把国家失败归因于观念、文化,试图通过观念启蒙、全盘破坏传统文化解决国家根本问题。形成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仍在外部:一方面是日本思想的支配,福泽谕吉等人把东亚各国的落后归咎于中国文化,又配合日本征服中

国的野心持续贬低中国历史和文化;另一方面是美国思想的支配,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霸权易位美国,美式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大行其道,主张全盘美国化。

可以拿同时期的德国做一个比较。19世纪30、40年代,自由主义理论传入德意志地区,知识界信以为真。长期经商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却打了一个比方:英国人爬上了墙,就会把逐步攀高时所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,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。李斯特认为,真正让英国人富强的是工业化,而非自由贸易或个人权利。工业化过程中,英国在经济上奉行重商主义,在政治上奉行保守主义;但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,却把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向全世界推销,其真实用意是打开各国门户。基于此,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意志精英群体总体上拒绝英国式自由主义,强化国家权力,最终德国实现了工业化一现代化。

破解古今中西之争

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,从根本上扭转了自由主义思维方式占据主流的态势。历史唯物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世界政治体系理论,为中国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和改变世界的方法,从思想上,更从实践上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奠定了基础。

首先,消解古今中西之争背后的文明中心论。古今

中西之争的实质是用文化解释历史,将观念、意识当作解决方案。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,历史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,文化只是其观念反映而已。西方的兴起是因率先实现了工业化,中国挨打是因生产力落后,从而导致军事能力低下。在思想和实践上纠缠于文化问题,甚无谓也。

其次,消解中西之争的话语体系。中西之争体现了非历史的文明类型学论说方式,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予以简化、整体化且固化,以西方现代富强的事实推定其现代文化优越,进而推定西方文化整体优于中国文化。然而,西方先于中国实现工业革命,并不能证明古希腊哲学、新教伦理、启蒙运动或苏格兰道德哲学高明。反过来,中国没有率先实现工业化,也不能说明儒家思想低劣。一些人通过文明类型学论证中国文化存续的意义,却没有看到革命与工业化的必要性。

最后,消解古今之争的判断标准。古今之争把中西文化之别看成古今之别,即古代与现代、落后与先进之别,体现了一种单线的现代历史发展观。列宁则分析指出“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、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: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”,两类民族的世界处境相反,自然走上了相反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,西方现代文明是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性质的,广大被压迫民族对其

进行反抗、革命,通常选择社会主义,从而形成民族主义一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。

通过历史唯物主义,中国共产党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中心,破除帝国主义与依附性封建势力的工业化结构性障碍。革命胜利后,又通过社会主义推进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国家发展。这一能动的、革命的现代文明创造进程,经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凝定,使今日之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。

这一创造性实践不限于思想、文化,而是总体性的现代文明创造。文化是其组成部分,且有能动性,但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基础,与相应的政治、社会制度等辩证统一于“总体性”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突出特点,在于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、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统一。在现代世界占据领先地位的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,与在古代世界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华文明相互作用,“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”。

随着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问题通过中国实践得到解答,古今中西之争已不再成为问题。但历史没有终结,中国思想和政治进入新阶段,中心问题转变为“世界向何处去”。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性倡议给出了原则性答案,中国思想学术界需要关注、研究以发展推进文明进步的实践,在世界层面上思考古今中外问题。